

“考證確鑿”與思想的力量

1985年，我研究生畢業，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，套用“入所教育”的俗話一句，我已正式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“新兵”。這時，楊天石老師早就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員“健將”了。從年齡到學問，楊先生都是我的師輩。相識相交近四十年，從楊老師處獲益多多，沒得說，一直以老師相待。但沒想到入所不久，就被楊老師賞識有加，以友相待。作為“新兵”的我，端的是受寵若驚。近四十年亦師亦友，學術、思想、觀點的交流更無拘束也更加暢快、更加深入。楊老師還具有深深的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社會關切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，在本職工作之外，曾兼任以實事求是、秉筆直書著稱的《百年潮》創刊主編，著名理論家龔育之先生將他與胡繩、鄭惠並譽為《百年潮》創業“三君子”之一。他有幾次“直言上書”，事先都徵求我的意見，士人風骨，令人敬佩，而對我的信任，更令我深深感動。當然，還是沒想到，楊老師此次竟然邀我為《思潮與人物》冠序，一時間感悚並至，確感榮幸，同時又知道自己其實無此資格與水平。恭敬不如從命，不揣冒昧，竦然作序。

楊老師認為，追求歷史真相是歷史學最基本、也是最重要的功能。無論這種真相多麼“不如人意”，也必須面對。這是他對自己治學態度、方法的要求。幾十年前著名的“中山艦事件”，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一次事件，已成板上釘釘的“鐵案”。但楊老師卻細讀史料，於不疑處發現可疑之處，一點點尋找、發現、研讀、分析史料，在80年代發表的《中山艦事件之謎》，還原了“中山艦事件”的真相，被譽為具有“世界水準”的好文章。他對史料的追尋，著實到了“上窮碧落下黃泉”的地步。他在海內外到處搜尋史料，早早就發現了錢玄同未刊日記、《蔣介石日記類抄》，對史料幾近“竭澤而漁”。不預設立場，不為既有觀念束縛，注重史料的爬梳考證，尊重史實，楊老師堪稱典範，為學界公認。

“考證確鑿，堪稱傑作”，是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狹間直樹教授對楊老師的評論。日本學者向以資料搜求仔細全面、考據認真著稱，狹間先生此評確為的論，是楊老師治史方法、風格的總結概括。

二

“考證確鑿”的盛名，卻無形中掩蓋了楊老師學術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。其實，楊老師的學術研究恰是從思想史研究起步、開始跨入學術大門的。楊老師是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，畢業後到中學當老師。這時他寫的明代泰州學派傳人韓貞、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良的研究文章，就先後發表在權威的《光明日報》“哲學”專刊和《新建設》雜誌。他的研究，引起了史學大家侯外廬先生的注意。“文革”結束，楊老師從中學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成為專業研究者。

歷史研究向有兩種傳統，一是“六經注我”，一是“我注六經”；用現代學術語言來說，一種強調研究者主觀觀念的主體性投射，一種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實證分析。前者高屋建瓴，自成體系，但易失之於空泛，根據不足而形

國家是誰的？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，國家被認為是皇帝的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”只是到了近代，國家才逐漸被認為是國民或曰人民的，因此，與“君主國家”的概念相對，就出現了“國民國家”或“人民國家”等概念。

一、清末天賦人權思想的輸入與“國民國家”思想的萌生

中國古代認為“天子受命於天”，人間的統治權被塗上神權的色彩。19世紀60年代以後，西方的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陸續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，中國思想界獲得新鮮養分，傳統的“君權天授”說受到搖撼。戊戌維新運動前夜，君主專制思想受到猛烈批判，民主思潮日益澎湃。何啟、胡禮垣提出，國家一政一令，必須以民為準，“民以為公平者，我則行之；民以為不公平者，我則除之。”¹嚴復提出：君民關係，“通功易事”，只是一種社會分工，民才是天下的“真主”。²譚嗣同提出：生民之初，本無君民之分，君由民舉，立君為民，“事不辦”則“易其人”。³這些言論表明，“國民國家”思想已經呼之欲出。到了梁啟超筆下，“國民國家”思想更得到了比較充份的發揮。他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從“多君為政”，發展為“一君為政”，直至“民為政”。⁴他直斥君主為“私”，民主為“公”，反映了這位改良主義政治家思想中的激烈一面。⁵戊戌變法失敗後，梁啟超的“國民國家”思想進一步發展。他明確提出：“國也

* 原載日本京都產業大學《世界問題研究所紀要》特別號，1998年；錄自楊天石：《哲人與文士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。

1 《曾論書後》，《新政真詮》初編，格致新報館1901年版，第18頁。

2 《闢韓》，《嚴復集》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34—36頁。

3 《仁學》，《譚嗣同全集》下冊，北京中華書局增訂本，1981年，第339頁。

4 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》，《飲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2冊，第2卷。

5 《與嚴幼陵先生書》，《飲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1冊，第1卷。

者，積民而成。國家之主人為誰，即一國之民是也。故西國恒言，謂君也，官也，國民之公奴僕也。”¹將一向高踞於人民頭上的“君”與“官”都視為人民的公共“奴僕”，這是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式的言論，後來曾為孫中山所繼承和發揮。

應該指出的是，維新派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“國民國家”的主張，但是，在實踐上他們追求的卻是“君民共主”的國家，因此，他們普遍提倡“民權”，反對“民主”，即只承認人民有參預政治的部分權力，而不肯承認人民可以當家作主，在事實上擁有國家的全部權力。

二、孫中山的民主思想

不僅在理論上，而且在事實上追求“國民國家”的是孫中山。

1894年，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提出“創立合眾政府”，所謂“合眾”，就包含了“國民國家”的意思。1905年，孫中山在同盟會誓詞中提出“建立民國”，這是近代中國史上首次明確地將“國民國家”作為奮鬥目標。這個“國民國家”的標準，根據1906年制定的《軍政府宣言》，它應該是：“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，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。大總統由國民公舉。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，人人共守。”²不過，孫中山認為不可能一步到達這個境界，開始只能建立軍政府，實行軍法之治，第二步是約法之治，軍政府總攬國事（兵權、行政權），而將地方自治權交給當地人民，由人民選舉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員，各方的權利、義務均規定於約法。第三步才是憲法之治，軍政府交出全部權力，國民公舉大總統及議員，組織國會，由憲法規定的國家機關分掌國事。孫中山後來將這三步設想稱為軍政、訓政、憲政。這三步設想的劃分未必妥恰，但孫中山認為，民主憲政是一個過程，必須分階段、循序漸進，無疑有其合理因素。

民國建立，1912年3月，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通過《臨時約法》，共7章

1 《中國積弱溯源論》，《飲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2冊，第5卷。

2 《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》，《孫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，第297頁。

漢唐；不僅復於漢唐，且將復於三代。總而言之，一切文物制度，凡非漢族的都是要不得的；凡是漢族的都是好的，而同是漢族的，則愈古愈好。錢玄同是個言必行、行必果的人。武昌起義之後，“辮髮胡裝”自然可以免去，但西裝革履也非所願。怎麼辦呢？他想起了“深衣”。古書上記載，這是諸侯、大夫和士平時在家閒居時所穿的一種服裝，上衣和下裳相連，大概是一種男式連衣裙吧？古代沒有攝影術，也沒有裁剪大全一類的書籍，具體式樣早已失傳。好在錢玄同曾經從學於國學大師章太炎，考證是拿手好戲。於是，從1911年12月中旬起，他便參考《禮記》、司馬光的《書儀》、題為朱熹所著的《家禮》以及黃宗羲、任大椿、宋綿初、張惠言、黃以周諸家的論述，做了一部書，叫做《深衣冠服說》，並且照所說的做了一身。1912年3月，錢玄同到浙江軍政府教育司當科員，便穿上這一身自製的套房：頭戴“玄冠”，身穿“深衣”，腰繫“大帶”，上辦公所去，其結果是贏得大家笑了一場。

上述故事，見於錢玄同的一篇回憶文章《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態度底變遷》。文中，錢玄同還坦率地承認，更早的時候，他是個地地道道的保皇派，崇拜清朝“皇上”；為此，撕毀過譚嗣同的《仁學》，指責過具有革命思想的朋友：“吾儕食毛踐土，具有天良，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論？”錢玄同寫這篇回憶文章是在1924年末。那時新文化運動早已“鑿歌奏凱”，錢玄同也早已成了名人了。

世事多艱。人難免要做錯事、走錯道，貴在能不斷總結、棄舊圖新。錢玄同復了一陣子古，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，他“大受刺激”，“知道凡事總應前進，決無後退之理”，於是進而“疑古”，這就好；又進而在成為名人之後，仍能自揭老底，以自己做錯的事、走錯的路昭示來者，這就更好。生活、事業都需要這種精神。

有些人，總想塑造自己一貫正確的聖哲形象。諱言錯誤、諱言失敗，明明有錯，卻硬不認錯，甚或飾非為是，又甚或打擊別人、以非作是。這種人，在錢玄同精神面前，是否感到汗顏呢？

潘漢年與錢玄同*

——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

潘漢年以從事中共的秘密工作著名，但是，他還是一位優秀的文化人。關於前者，史學界研究已多；關於後者，史學界也已開始研究，不過，留下的空白尚多。錢玄同家藏潘漢年書札一通，可以說明這位傳奇人物早年活動的一個方面。函云：

玄同先生：

你老雖只歡迎民間文藝裏的戲劇、故事、小說，我偏要抄幾首我“收藏袋”裏的歌謠給你看看，你會說它的價值在故事、劇本之下嗎？——所以我主張《メロウユウヲ（國語週刊——筆者注，以下同）》上同樣收載歌謠。今先寄上幾首給你看看，你如歡迎在ユウヲ（週刊）上發表，我盡可絡續抄來；我的“收藏袋”裏至少也有百餘首了！

カークカ（您老）如一定說：窮鬼！你要出風頭好送到《歌謠週刊》上去發表，則我也只有叩頭謝罪，不應該多此一舉！我對於民間文藝興味特別好，像有些故事，很高興用筆去述出來（有現成文字記述的，我當然不必費神），不過我一度試驗的“ユメ（苦啊）故事”寄給周作人先生後，《語絲》上也不見刊出，大概是我的文字太壞，被扔在字紙簍裏去了！本來我也忒年小膽大，我的狗屁文字，怎麼好送去與你們的大作排在一起呢！但我總還希望有一天周先生能把我的大作退回讓我重做一篇！

再讓我說幾句閒話。《メロウユウヲ（國語週刊）》的印刷有時太不清楚了，你們為什麼不和手民先生們交涉一下？

哈，我的上司カーク（黎）今灰和郭後覺，看見我身上“落湯雞”的樣

* 原載《百年潮》，2003年第7期；錄自楊天石：《哲人與文士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。

進一步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*

——訪榮譽學部委員、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

附錄

記者：和許多古老學科比較起來，中華民國史還是個比較年輕的學科，您能否談談這一學科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嗎？

答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不久，董必武、吳玉章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提出要編纂《中華民國史》（同時重修清史）。1956年，國家首次將《中華民國史》列入全國科學發展規劃。1971年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，周恩來總理再次指示，要編纂、出版《中華民國史》。1972年，經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報請國務院批准，通過當時的“出版口”將此項任務下達給近代史研究所。近代史研究所當時的副所長李新接受了這一任務。李新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，到過延安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，當過吳玉章同志秘書，有眼光，有魄力，曾組織陳旭麓、孫思白、彭明等編寫四卷本《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革命通史》，獲得好評。他接受任務後即在近代史所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組（後改為室），制訂編纂計劃，採取“來者歡迎”的辦法，吸納了不少所內的年輕學者參加工作，同時，又聯合全國多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開展協作。今天中華民國史這一學科能發展起來，不能不感念李新的開拓之功。

記者：為什麼老一輩革命家在建國以後就提出要編寫《中華民國史》？在您看來，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這一學科有什麼樣的重要性？

答：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文明史，有悠久的史學傳統。從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，到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，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大量的歷史著作。它們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。依靠這些著作，我們民族的生存、發展歷史斑斑可考。從

* 原載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》，2006年12月14日；錄自楊天石：《抗戰與戰後中國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。

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，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始，到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，時間不過37年。但是，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段落——一個客觀存在，不可否認的段落。自然，這一段歷史也不可以沒有記載。缺了這一段的記載，中國歷史的發展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環節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倡編寫《中華民國史》，其原因我想主要就在這裏。

至於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的重要性，我想不外兩方面。一個是學術，一個是現實。

自19世紀中葉起，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會，中國人民開始了外抗列強、內謀解放，爭取國家獨立、富強和現代化的鬥爭。在孫中山領導下建立的中華民國實現了中國國家政體的變革，是這一鬥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是一個更重要的里程碑。歷史不能割斷。今日中國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文化等方方面面，都是昨日中國有關方面的發展。兩者之間有著切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只有瞭解昨天，才能更好地發展今天，預見明天。我們要建設新中國，就必須瞭解此前的中國，認真清理民國歷史，總結有關的經驗與教訓。隨便舉個例。我們在處理對日關係時，常常說：“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”。這裏所說的“前事”就包括民國時期的中日關係在內。不瞭解民國時期中日關係中發生了什麼，怎樣發生的，如何能發展新時期的中日關係！最近中日兩國外長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會晤，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有關共識，決定根據“正視歷史、面向未來”的精神，開展中日雙方的共同歷史研究。其內容包括中日兩千多年的交往史、近代不幸歷史以及戰後六十年的中日關係發展史。這其中的“近代不幸歷史”，就包括民國時期在內。中日關係如此，中外關係的其他方面，中國建設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如此。

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，這就是實現民族和諧，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。

民國史上，國民黨曾經是革命的、愛國的政黨，有過辛亥革命、反